

透镜：晚清国人印度游记中的二重观照

文/章可

一、引言

中国与印度同为亚洲古文明，彼此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历代往来两地之人也绵绵不绝。在宋代以前，中国已有如法显、玄奘等佛教高僧赴印度求证佛法，两方交流中的“佛教因素”在唐代趋入高峰。〔①〕宋元以后，海路渐开，商贸勃兴，又极大改变了交流的途径和面貌。〔②〕到晚清时代，由海路至印度已成通途，康有为在 1901 年到印度，他记述道，从广东到加尔各答，“月有汽船六艘，海波不兴，如枕席上。遇粤之木工、履工集于印度者数千人，吏于卫藏或商人多假途出入，岁月相望，视如门户。”〔③〕可见交通之繁密。

由于海路通畅，宋元以来各类叙述地理见闻的书籍中，有关印度地区的记载较多见，然而，自宋代到 19 世纪，中国人士专门赴印度游历、并写下游记刊印的，却极为稀少。在 19 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力量对印、中冲击甚大，打破了原有的两地交流模式，形成更为复杂的联系和网络。既缘于此，对清帝国而言，在“中 / 英”、“中 / 西”对抗的大格局下，“印度问题”重新又开始凸显其价值。在晚清时代（1840-1911）出现的多种国人赴印度游历记述，大多与此背景有关。

研究晚清国人的印度游记，并不能再抱以中、印本土的地理文化差异，或是佛教交流之类的传统眼光，而需导入新的视角。本文以“透镜”为题，意在将此时的印度比作一面不完全透明的镜子，一方面透过玻璃镜，国人得以获得看待英国及其殖民势力的一种特别的渠道和方式，而另一方面，当时国人又以这面透镜反过来看自己，省思自身的处境。〔④〕这两种观照方式在印度游记中频繁出现，有时还粘连一道，印度和英国交替地成为国人设想中的“他者”，而在这种“他者”移位的过程中，记述者的立场和认同也会产生游移，不断变化。相比较晚清出现的大量使欧、使西的游记，印度游记中这类“多重他者”的张力，使相关研究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样态。

在思想层面，旅行是既有观念和异域体验的交融。人们步入新的地理空间，所思所感既源自新鲜情事的冲击，也和“想看到什么”的期待密切相关。晚清国人的印度游记中，亦有两人或多人同行，行程大抵相同，但所记、所感颇有差异的情况，这正可体现各人既有观念和“期待”的不同。不仅如此，就连何为“旅行”，何为“游记”，都有不同之标准。

在康有为游印度前，仅在晚清时期就有多人赴印，留下记述，但康氏视若不见，称自己是秦景、法显、三藏之后中国人游印度的“第四人”。〔⑤〕光看此句，批评者可能会说康氏乱下妄语，但这并非全然缘自康有为见识缺乏，晚清时期往来中印两地人数众多，他已有亲身体会，黄懋材的记述他也读过。但在康有为看来，行游印度之人，如不能“记印度之教俗、文字、宫室、器用，发其祖父孙子，镜其得失派别，以资国人之考镜采择，以增益我文明”，则与未游无异。此即所谓“非深于教俗、政治者，不能游也”。〔⑥〕

康氏一贯自视甚高，发出这样议论也不奇怪。但这正好说明，“游记”在一些人眼中，并非简单的对物理空间移换的记录。在近代的特定语境中，更可能承载着“国家”和“文明”层面的使命。本文即以晚清时代出现的几种印度游记为考察对象，〔⑦〕对其中体现出的特别观照方式

略作分析。

二、英印风貌：黄楸材的理想化描述

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人从海路到印度，并在印度沿海地区活动。早在明末，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撰写的《职方外纪》里就提到欧洲人在“印地亚”与当地人的往来。^[8]而在鸦片战争以前，如《海国闻见录》、《海录》等书籍，在“小西洋”部中都有对印度的介绍，也明确提到英国人已占据了印度东西沿海诸地。^[9]到1840年前后，在一般所谓的“开眼看世界”时期，由于时局变化和对抗英国的需求，士人探求有关印度的知识，已不仅是出于单纯了解“海外风物”的“广见闻”目的，而带上了“知夷情”、“筹制英夷”的现实战略意图，这一点在《四洲志》和后来的《海国图志》当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由于印度既是鸦片生产地，又是中英对抗的中间区域，自然较被看重。魏源在《海国图志》“印度国志”中加了大段“按语”，以传统“合纵连横”的眼光，大谈“以夷制夷”之方略，^[10]即是典型代表。

尽管后来许多到南洋、印度的行旅者都会随身带《海国图志》或《瀛寰志略》等书籍，备查各处地理，但毕竟此二书的编者都未亲身到过印度，记载与实情多有出入，议论也难称切于实际。时势移转，到了光绪年间，讲求“洋务”已成风气，游历印度之人，已不满足于空泛的言说，而希望了解英治印度的更多实情。

晚清第一次官派专员游历印度是在光绪四年（1878年）。士人黄楸材经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委派，游历印度，“察看形势，绘画舆图，以资考证”。黄楸材原为江西贡生，对经世之学多有探研，^[11]许庚身在江西学政任上时，以“品学兼优”之荐语推其入同文馆学习，后经总理衙门考察，得以受派。

为何这时要派人考察英印？此前，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附有专条，清帝国准许英国可以派人从中国或者印度进入西藏，“探访路程”。后就有英国人试图从四川等地入藏，多被阻止。事实上，以丁宝桢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官员都担心英国人借此机会打通从印度经大吉岭到西藏的道路，对西藏的防务、甚至对四川和内地造成威胁。^[12]总理衙门的奏稿中也认为英人“占据独吉岭，加意经营，尤与卫藏逼近”，形势较为紧迫。所以，经丁宝桢提议，总理衙门选派，委任黄氏一行去印度考察，主要是搜集政治、军事、地理水文等各类情报信息，以备资考，本身并没有特别的交涉目的。^[13]

因为此行并无特定目的地和外交使命，相较而言，黄楸材在行记之中游历和“观看”的范围很广，记录各地风貌物产也详细。从黄氏自身的背景看，早在他入同文馆学习之前，同治五年（1866年）他就曾到上海游历考察，后还撰成《沪游臆记》。《臆记》虽然名义上是记录他在上海华洋两界游历的所见所闻，今日的学者也多把这书当成研究上海开埠早期历史的重要史料，^[14]但其中更大的篇幅反倒是在议论世界局势和英、法、俄、美等西方各国的情况。从中来看，黄楸材对英国的国力最为钦慕，称其“兵强国富，雄长欧罗巴洲”，而后说“南洋众岛，蚕食殆尽，印度亦归钤辖，备列屏藩”，此外，他还提到印度的电报电线，在谈论世界各国风俗时，也谈到印度一些地方女性的“穿耳之俗”。^[15]凡此种种，说明当时他对英治印度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或许由于在上海时和西人、洋货、洋物的接触，再加上身负考察英人治印的使命，黄楸材行旅中便有特殊的眼光。当时由海路赴印，最先到达的是英人经营最久，用力最深的加尔各答

附近的孟加拉（Bengal）地区，种种当时中国尚无的新鲜事物涌来，黄氏的记述中艳羡之情流露，还带有很多理想化的描述。

1879年，黄楸材在从缅甸驶往印度的船上，就开始感慨英人的船只“华丽整洁”、房壁的桦木纹理如画。[16]而到印度后，首先即称赞火车之便利，[17]他说“昔疑火车铁路工费浩繁，乃今观之，殊易为也”，“人坐其中，不失常度，无颠簸之苦，无炸裂之危。平时则商贩易于流通，有事则征调不致延缓。迩来太西诸国，莫不日新月盛，以此为急务”。在早先的《沪游胜记》中，黄氏已经记述到西方的火车，但那时还只是听闻，并没有亲眼目睹，此番从加尔各答坐火车到大吉岭，让他大为赞叹。行旅者对于交通工具往往天然带有亲近和敏感，在之后的印度游历中，他多次搭乘火车，到达德里、孟买等地，游记中也反复提到。

此外，令黄楸材赞叹的“声光化电”之事物还有不少。比如他谈电报快捷，当印度总督离开加尔各答，在别处度假时，“遇有大事，仍由电报请命焉。虽相距三千余里，然往复甚捷，无异面谈。”[18]再比如自来水，英国人在麻利坡建水厂，“汲起之水经过池中砂底，则澄清洁净，用大铁管引至卡呢格达（加尔各答），足供数百万人，用之不竭。”最令他感慨的是城市街道的煤气灯，彻夜光明，他反复提到，还认为即因此“宵小之徒难以潜踪，故盗窃之案稀有”。[19]另外还有球场、花园、博物院、动物园等等，这些黄楸材都以细致的笔触一一记下，言语中大加赞赏。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黄楸材对这些新事物其实只有浮光掠影的了解，其中不免有许多美化的想象。对英治印度的这种观看方式，已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理的驱使，更有一种理想化的选取。急于效仿西人、发展洋务的心态和旅人特有的、夸张的异域描述结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观看”仿佛戴上了一副“玫瑰色的眼镜”。[20]此种情况在晚清并不罕见，我们在郭嵩焘西的某些记述和王韬的《漫游随录》当中也能找到。

黄氏对英治印度的赞叹不止于器物层面，比如他还称赞英治印度官员行政的高效率，“分职任官不越俎而代庖，无公牍转移之繁文，无堂廉睽隔之流弊。故官皆亲理庶政而不甚劬劳，事必众谋佥同而不得专擅。俸禄之厚足以养廉，莫不爱惜声名”；[21]他还描写法院、律师、警察等司法和执法体系的完备，在他的笔下，整个印度政治清明、社会有序、产业发达。

所以，黄楸材的这种赞词与其说给予印度，不如说是在谈英国。林承节在上世纪90年代初著书，着眼“中印友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也承认，黄楸材此行过于关注殖民势力带来的新鲜事物，在记述中情不自禁“流露出羡慕之情”。[22]在黄笔下，印度不仅是英国的属地，更是它治理亚洲的模范样板。游记叙述大多以英人、以治理者为立场所在，很少从印度民众角度着眼。黄氏一行在印度本土游历有六个月之久，足迹遍布德干高原以北的半个印度，且他们并非行程紧密、无暇旁顾，与印度普通民众的接触其实并不在少。但在他的记述当中，只有只言片语关于当地人服饰、饮食的描述，显然他对印度本土的风俗人情并不在意，关心的也只是“商贾富民多效英人装束”此类。

最明显的是，黄氏并不看重区分“英/印”，他有时把英、印两造的政俗合为一谈，以与中国对比，比如他说“中国之政，必先便于贫民，西国之政，则独优于富室。盖其俗以贫为耻，故民皆争利急功，趋于勤而不敢惰。国势以商贾为重，赋税多富民所输。是以任意行乐，无所束缚也。”通过游历印度而谈“西国”，身在印度而大谈民众“趋于勤而不敢惰”，这看似怪诞的言论，正体现出他的观察方式。

再如，他提到英治印度税制名目众多，赋税繁重，但奇怪的是“民无怨言”，“盖昔之土官番酋，率多残刻，不知爱民，诛求无艺以视。英人今日之政不啻出水火而登衽席，又所入之财仍为本地之用。除官俸、兵饷之外，一切修治道路、桥梁、轮船、飏车、电线、煤灯、学堂、医院之类，民多便之，是以人心亦颇相安。”[23]此等粉饰之词，可能出于英人之口，而黄氏一一记录，奉为至理。

如何看待这种记述？即使黄楸材对英国统治上层有“任意行乐、无所束缚”之类的描述，其实这都不能被看作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相反，这其实是黄氏好奇眼光的产物。在认可英国人对印度统治的大前提下，这是以积极的心态对英人“统治术”的探求和学习。就客观效果而言，它从另一个方向与欧洲扩张主义和英国殖民主义话语形成了应和。这情况在早期出国游历的洋务人士身上，并不难见到。

黄楸材受命游历，他本人既非久于官场的能吏，也不是素有经验的外交人士，眼见事物虽多，但他对真正兴办实务的难易却少有体会。因此，其印度游记虽然记述丰富，但许多地方细细读来带着浓厚的书生气。黄楸材的游记隔一些年后刊布，影响寥寥，提及者甚少。其人游历归来后，官运坎坷。我们或许可以就此窥得一些原因。

三、反观乎己：印度为中国提供教训

就在黄楸材到印度两年后，1881年，马建忠受北洋大臣李鸿章委派，赴印度拜会印度总督，商讨鸦片专售事宜，同行人中还有其好友吴广霈。[24]两人此行都撰有日记，后来刊行。[25]从行文中看，两人都不知道两年前的黄楸材之行。[26]若考察此二人游记，则他们对英治印度“时新之事物”的描述要少很多，且其立场也发生了转换。

日记记述有差别，原因有二。首先是作者的背景差异，与黄楸材不同的是，马、吴二人均非首次出国。马建忠此前留学法国，1880年回国，在天津协助李鸿章襄办洋务。[27]而吴广霈曾以二十出头的年纪出任驻日公使随员，在日本近两年。因此从他们的笔触看，多关注实务，少了许多对异域、西潮的新奇感。

其二是出游使命的差别。马建忠一行乃受李鸿章委派，目的是想使中、印两国的鸦片贸易建立专售通道，统一管理征税，切断私运渠道，以扩大清政府财政收入。因而他们出访拜会印度总督等英印当局上层，然而，实际交涉过程可谓阻碍重重、步步艰难，最后并没达成实质成果，无功而返。马、吴二人对鸦片的流毒危害都深有所感，旅行过程中与印度各处的英人官员反复谈判，因此，相比而言其眼光就不像黄楸材那么单纯。

使命的差别也带来记述风格的不同。黄楸材出游本就以搜集信息、考察情报为目的，《西轺日记》和《印度札记》广泛记录他在印度游历所见新鲜事物，时时加以评论感触；而马建忠则身负特定公务，行记中大段都是在香港、东南亚、印度各地与中外官员、友人交涉相谈的记录，几乎全部都是围绕鸦片的生产、转运、售卖和税务问题，尤其与印度总督、省督等官员的来往问答，牵涉相关数据等等，事无巨细，全部记下。作为出访团队首脑，马氏的日记与后文所述1905年访印考察茶务的郑世璜之日记类似，[28]关注点集中，行文严谨，与其说是随性而书的游记，不如视之为带有公务色彩的外交报告记录。

不仅如此，马建忠和吴广霁两人的日记也有所不同。吴广霁在《南行日记》中曾经提到，他曾为马建忠（眉叔）“删润”日记，[29]所以他承担的是马建忠的助手和书记的任务，由此可见马建忠的日记是经人有意处理成官样的报告文体。相比之下，吴氏的《南行日记》内容就自由和丰富许多。吴广霁自己本就心细善思，阅读广博，对比马、吴两人所记行程也可知，马建忠在各处的公务拜访，吴广霁并未时时跟随，因而有更多的闲暇游历时间，处处观察，相比就议论更多。

尽管不如黄楸材笔调夸张，但印度风物对吴广霁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只不过这种冲击带来的并不是正面的赞赏眼光。吴广霁之前对印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与佛教相关的经籍和传说，而对印度人外貌的印象则止于佛教画像和造像中所见。1881年，吴广霁刚到印度加尔各答的第二日（光绪七年闰七月初七），午后在寓所附近散步，看到“土人肤黑如泥，男女皆丑劣”，毫无佛经中“好相庄严”的模样，且被英人任意役使。又见其群坐吸烟，“咽喉有声，秽恶可厌”，一时百感交集，大发感慨。[30]

肤色黑白之对比是古代中国种族观念的重要部分。自宋代以来，随着对外交流增多，种族意识也愈发突出，肤色的深浅审美与文化的优劣开始挂钩。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的神被汉化，与肤色较深的南亚人相区别，在外形上体现出“由黝黑半裸的印度人向肤色偏浅、衣饰庄重的神的转变”。[31]对富有教养的中国士人而言，初到东南亚和印度，接触到外貌与想象中大相径庭的当地人，由视觉反差到观念冲击，从而将他们加上“低劣文化”的标签。康有为在印度行游时，多次提到印度下层人士肤色偏黑、身材矮小，并以此判定他们头脑愚笨，缺乏自我主张，只能被人奴役。[32]再如薛福成在1890年出使欧洲途中路过南洋和印度地区，接触到许多当地“土民”，他毫不掩饰地称其“无不面目黝黑，短小粗蠢，以视中国人民之文秀，与欧洲各国人之白皙魁健者，相去奚啻霄壤”。[33]这也是把肤色外貌和文化判定相混合的例子。

就整体而言，马建忠和吴广霁在阐述英印问题时，仍以英国为统治正统。比如两人在途经“亚格喇”（Agra，今译阿格拉）时，游览泰姬陵，后谈论印度历史。在论及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时，日记中称印度莫卧儿皇帝“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并称印度士兵为“叛”，英国军队“剿平”。种种用词，体现他们认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正当性。[34]

尽管如此，吴广霁对印度民族的看法，与黄楸材相比已有立场上的扭转。黄氏所记都是印度在英国治理下日新月异、政俗改良之处，而吴广霁看到的大多是印度本土民众被英人役使而“不能自立”。吴氏当然也记到印度的各项公共设施、总督的避暑别墅花园等种种宏伟或华美建筑景物，但其眼光已有不同。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吴广霁曾写下《救时要策万言书》，其中在“广游历”一节就说，以往外派游历士人，“颇多滥竽俗士，帖括陋儒，未明政教之大体，只震惊于西人之宫室车马一切外观之美，敌情未谙”。[35]虽然他并不一定知晓黄楸材的游记，但可见他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在19世纪后半叶不在少数。黄楸材夸赞英国人在印度的种种治术法度，但吴广霁于此则着墨极少，他把英国得以统治印度的原因，归于印度人自身不思进取，采取的是印度民族主义的视角。

还是在刚到加尔各答那天，吴氏就感叹“以数千里富厚之国，二百兆繁庶之众拱手受人，仰其鼻息，颀颜苟活”，其后看到印度人群坐吸烟、晨起跪拜等景象，吴心生反感，联想到印度古代文明灿烂，近来古教衰落，被他族统治，说印度人“不知不识，无机巧诈”，“一旦海道通，他族至，遂至佛教顿息，降为奴隶。然犹上下恬然安之若无事，不亦哀哉？不亦羞

哉？”

出于中国自身体验的投射，吴广霁对英国侵入东方之地、贩售鸦片毒害民众等，颇感切肤之痛，因此并不像黄懋材那般感叹英人治理良善。他从反向着眼，对印度人则很有“怒其不争”的情绪。即使他后来游历拉贾斯坦，考察当地土邦抗击英国人的战场旧地，还发感叹，认为保卫疆土，仅仅“恃贾勇于疆场”还不够，根本在于“内政之修”。[36]若论言说立场，吴广霁已把印度与中国置于同一阵线，前者彻底成了反面教训。

吴广霁在潜意识中，时常以印度作为主体与中国相比，他说印度之地“富厚繁庶”，“东西约五千余里，南北约七千余里。土地较中国仅得三分之一，岁出度支六十兆金磅，则不啻八倍中国，富可知也”。吴广霁此前对印度近代以来历史的了解，仍不出《海国图志》之类地理志书所记范围，对细节把握有限，在他看来，这样一块宝地，每年物税产出如此之高，但这般就轻易落于英国之手，只能归因于当地人不思进取，甘为奴仆。先存了这个意识后，吴在印度所见种种，都为佐证。

黄、吴两人赴印，前后只差两年，如果说黄懋材是期望透过印度这面透镜去观看英国，那么吴广霁则更多是以印度这面镜子来反照中国自身。吴氏之前已有在驻外使馆参赞事务的经历，再加上与马建忠之类通晓洋务的友人多相谈论，对操办实务、交涉往来之不易，早有很深的体会。因此，马、吴二人对于西人西物，已经脱下了“玫瑰色的眼镜”，而怀抱防备和敌对之心。

比如，吴广霁从清国防务和“亚洲大局”着眼，对欧洲人在东方各国的活动很是警惕。和黄懋材对火车通行便利大加赞扬不同，吴广霁听闻英人欲在印度东北部修建铁路，舍缅甸而直通云南，则大为担心，认为其“居心叵测”，将来铁道以“长蛇”之形蚕食各地，则陆路又起“滔天之祸”。

吴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有更深重的忧虑，“慨夫世风之降，列国纷争如猛兽竞逐，弱肉强食”，所以在此情形下，国家只有“革其故常”，倡导一种“兽性”，才不致在国际竞争中落败，才能够真正保存内在之“仁”。难得的是，此时的吴广霁，已经具有了“亚洲”的视野，他说，“环顾亚洲，自我中华而外，首推印度、土耳其为大国。今印度已矣，土社行墟，前辙之摧，后车可鉴”。[37]将亚洲的印度和土耳其作为反面教训，提醒吾国勿重蹈覆辙，这在他写作日记二十年后的世纪之交，是常见的言论，但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士人里，具备这种眼光的尚不多见。[38]

吴广霁的看法颇有微妙之处，若放大视野，这和晚清国人对印度总体看法的变迁相关，即从将印度视为中、英对抗的战略中间地带，转为与中国平等相当的、同样面临“近代转型”的东方国家，从黄懋材到吴广霁，即清晰地体现了这种转变。这种观念转变与西学的广泛传播、中国知识分子中“危机意识”的兴起都密切相关，从大体上看，也切合近代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以及中国人的世界观从“天下”到“国家”的转变。在吴广霁及其后的印度游记里，我们可以发现印度本身作为观看对象的主体地位开始凸显，而不再是作为英国这个“他者”的附属。

晚清官派赴印度考察的还不止黄懋材、马建忠等人，1905 年，时任两江总督周馥派遣候补道员郑世璜率团前往印度、锡兰等地，[39]考察当地的茶叶种植、生产加工和税收等情况。

整次行程前后长达四个多月。郑世璜此行写下《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而考察团书记陆澐也撰有《乙巳年调查印锡茶务日记》。[40]

茶叶本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物品，但自 19 世纪中期以后，印度产茶叶在国际市场上迅速崛起，到 19 世纪 80 年代，相比中国茶已占据优势。郑世璜此次带团考察的目的之一，正希望学习印、锡种植生产茶叶的经验。考察团回国后，郑世璜写成关于印、锡各地茶叶生产制作的详细报告，并向两江总督上条陈，提出改良中国内地茶业的诸多办法。[41]

和马建忠、吴广霁的日记类似，郑世璜和陆澐的两本日记记事颇有重合之处，且许多文句完全相同，郑世璜的日记中应有相当部分出于书记陆澐手笔。从篇幅来看，陆澐日记远大于郑氏的日记，且后者大多记载与茶业、经济有关之见闻，笔调朴实，平铺直叙，很少议论，即与马建忠《南行记》相似，属于公务色彩较重的考察报告。

相比而言，陆氏的日记内容就丰富很多。陆澐观察细致，记录详尽，使得这部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总体上看，他对印度人多有同情，无论是底层的劳工，还是颇具教养的知识分子。该年七月他刚到加尔各答后不久，在唐人街遇到当地华人陆云秋，后者又带他拜访当地印度上层人士，陆澐得以亲身了解当时孟加拉地区的印度独立思想。他记道：“得悉近年印人颇具自治思想，其词气之间，若谓我亚洲本一体，不幸近百年间，西力东侵，与贵国交际始隔绝云云。异哉！印人智识之发达，一至如是。”

发出如此感叹，显然印度人阐述的“亚洲一体”观念对他而言构成了新鲜的冲击，因而，他对印度民族在近代的遭遇，也多了几分感同身受的体会。和时人一样，陆澐对印度灭亡之原由要作一番考索，并总结成“阶级制度太严”和“恶俗陷溺既深”这两点，不论是根深蒂固难以消灭的“阶级制度”（即种姓制度），还是童婚、吸食鸦片之类的恶俗，都使得改革难以轻易推行，而整个南亚半岛上宗教和语言文化的多元复杂情况，更是对印度民族作为整体的复兴造成了阻碍。

尽管如此，陆澐还对印度的独立运动有初步了解，在同时代人中，他对印度独立的前景显现出少见的乐观，声言印度“将来必能独立”。他把推动印度独立的原由归为两条：“被动于日本、主动于学会”。外部有日本人士与印人多方交流，传播国民学说，激发民族平等意识；内部则印度受教育人数不断增加，对英印政府的施政敢于公开褒贬批评。其后，陆澐加以按语评论：

“印度之亡，其民族至今尤未忘怀，徒以智识未开，实力未足，遂含垢忍辱以至于今也。岂有开化数千年，人民三万万，永沦于奴隶之域，黑暗之天哉！时至今日，澳洲联邦自治矣，坎拿大设议院矣，影响所至，几及全球，维彼英人，其亦速改治印之方针哉。”[42]

20 世纪初，浓重的危机意识在中国知识阶层中蔓延，许多学人编译出版世界其他各国的“亡国史”论著，以他国之教训刺激本国国民的“救亡”思想。这其中也有许多印度“亡国史”的作品问世。[43]以陆澐的日记中体现出对印度的熟悉程度，他有很大可能读过其中若干。进而，“岂有开化数千年，人民三万万，永沦于奴隶之域，黑暗之天哉”这样的语句，不能不让人想起梁启超在 1899 年的名文《爱国论》中对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受制于西人的痛惜和警醒。[44]显然，以“光明 / 黑暗”的对比，陆澐把中国自身的体验代入到了对印度民族的想象当中。

中、印的经验互见，在吴广霈和陆澐的游记里，对中国自身命运的焦虑使他们观察印度时戴上了另一副特别的眼镜。无论如何，印度已经不再是英国的附庸，而具有了独立的“被观看”的价值。出现在陆澐日记中特别的谈话记录，或许是中国学人对 19 世纪以来的印度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以及英国人相应改变统治政策的最早记述之一。[45]

四、文明论说：康有为的对比式评论

和马建忠、吴广霈等人一样，康有为在 1901 年到印度时，并非他首次出洋。此前康氏已经游历多地。按他自己所说，之前他居住在槟榔屿，“暑热多疟”，染病数月不见痊愈，此时他听人谈到若赴印度北方雪山中疗养，极有功效，故转而乘船赴印。当年 12 月 12 日他到达加尔各答，此后几周他游历北印度各地，1902 年初至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筑草亭名“须弥雪亭”，住一年多后才离开。

在本文考察的六位印度游记作者中，只有康有为一人不是官派赴印，因而相比前述人士，他的游记书写呈现出更多个人化的色彩。康氏来印度之由，本就是客居南洋病恙之际的一时兴起，并非已有周密谋划准备。他在游记的自序中大谈印度古文明之发达，千年来游印度之人稀少，无人考察印度古政教和近事，称其“必有可可观而益中国者”，[46]总体上看，意在自抬身价当然没错，其中也希望对自己移居印度的选择进行“合理化”的解释。另应指出的是，康有为的诸多海外游记历来吸引研究者关注，而相比时间更早的《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之类，印度游记是他第一部逐日记事、充实清楚的长篇游记。与之前在加拿大时鼓动保皇救国，一呼百应的风光景象不同，康氏在印度隐居撰述，时时有寂寥之感，际遇变化，倒也催生出详尽记事的游记写作。[47]康有为在印度期间的生活和思想变化，是一个极大的研究课题，本文在此，仅就其游记中对印度和英国的观察方式稍作分析。

在 1901 年之前，康有为对印度有怎样的了解？按其自编年谱说，他在 1884 年读佛典书籍时，就开始对“婆罗门”思想有所了解，而后，在 1890 年编著《婆罗门教考》一书，[48]但自戊戌之后散失不存。且不论这本《婆罗门教考》是否实有其书，[49]但从如今留下的康氏文字看，1900 年前，他很少细谈印度古代文明。他第一次评价印度是在 1895 年，将印度与土耳其并称，视为“古大国今衰”的反面典型，在后来著名的《上清帝第二书》（《公车上书》）当中，他说印度“才智之士少”，即“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50]他还说印度太过守旧，“昔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守旧不变，乾隆时英人以十二万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丘印矣。”[51]其后几年里提到印度也多大同小异。这些看法，其实受《万国公报》等西人记述影响可能性更大。

在到印度之前，康氏已去过伦敦，[52]再加上旅居加拿大的时光，从 1900 年前后留下的文字来看，康有为对欧美社会的了解，在当时士人中已属极深，因此不会再有黄林材那般以印度看英国的“迷思”。康氏在印度时，也细心结交英印政府的上层，并观察其治理施政，比如他谈到，“英人之治印者，仍大用仪仗，以威异族。吾曾游伦敦矣，观英督之来，殆过英君主，不独其相无是也。英人之治印度，迥与治本国殊。”[53]这种议论，是在此之前的印度记述中很难见到的。然而，通观康有为印度游记，这是少有的从英人角度作的观察，而更为频繁出现的是“中 / 印”文明的比较，英人则往往是作为“外来者”出现的。

从总体上看，康有为为一力抬高印度古文明的价值，在游记序文中他说“夫印度者，大地之骨

董，教俗、文字、宫室、器用至古，为欧美文明祖所自出，文明所关至大也”，将印度文明视作西方文明的源头。他坚持这种想法，在谈宫殿建筑时也说，“欧人宫室之制全出于印”。[54]康有为泛读史书，此时并非对埃及、两河和欧洲古文明缺乏了解，但他一直声言欧美文明出于印度，是希望把多元的古代文明简化为“中 / 印”之别，以突出中华文明的特点与优势。他称赞印度保存古物良好，同是参观古迹，黄林材、吴广霈等人也到过泰姬陵等，也去过博物院，但只是单纯描述其精美。但康有为就提出“中国之不能保守古物，不如印度远矣”，康氏游历多处印度宫殿，感叹气象之宏大、装饰之华美。他还进一步提到，中国古代宫室多用木结构，无法保存长远，不如印度和欧洲多用石材，“动数千年”、“料坚而持久”。[55]

但此种赞词毕竟少数，若细细考察康氏的游记，我们会发现其中更多充斥的还是对印度的抱怨和鄙视，他游历北印度各地，所见街道大多污秽不堪，人民惰懒，礼仪怪异，甚至食物都粗糙而仅能果腹。[56]至于旅途之中的种种困难不便，印度风俗人情的难以理解之处，他都事无巨细而记下。

为何如此？我们只能认为赴印初期，康有为对印度的总体印象并不甚佳，此后林林总总，都只让他生出更多厌恶之心。这有二重原因，其一是在之前已到过英国伦敦和加拿大，不像黄林材首次出洋时眼中能见的都是与英人相关的新鲜之物，而康有为则更多对比，看到的是物质环境上印度不如英国和欧美诸国之处，且这种落差被他刻意地夸张放大，以致他经常发出“（印度）被英化久而不少改”之类的评论。

第二，和吴广霈相似的是，将踏上印度土地之时，康有为心怀的也是寻访佛教故土的美好愿景。我们从他刚到印度时写的诗句中能看得更清楚。康氏在印度期间所写的诗后收于《须弥雪亭诗集》，集中所见他在驻居大吉岭之前游历时所写诗，几乎每首都抒发他寻访佛教遗迹而不得的情感，“欲寻佛国清净土”、“遍寻佛教万里无”、“我来印度访佛迹”之类的句子反复出现，[57]显然，他因佛教在印度失落衰微而沮丧感慨不已。这也影响了他对印度的最初看法。

因此，尽管康有为感慨印度古文明如今“委弃不收”，“此则二千年来最可叹惜痛恨之事也！”但他更看重的其实是印度古文明中佛教的部分，也就是与中国有着相通联系的部分。康有为早年读佛典而知闻婆罗门教，仅是一种知识性的兴趣，从康氏在 1900 年前的著述中我们也很难找到有关婆罗门教的内容。康有为在印度游历之初，对当地的“婆罗门庙”，还算饶有兴味，但看过几处后便心有厌烦。当他到“乜刀喇”（Muttra，今译穆特拉）时，参观大寺，“土人言过河有婆罗门女尼极神，然绝无佛迹”，他便掉头即走，“不复观之矣”。[58]

康有为对婆罗门教的这种态度，不仅仅是他游览婆罗门庙的感官体验所致，更在于他认为其教对印度在当今的衰落有很大影响。大致而言，在康看来印度衰落原因有两层，其一是婆罗门教先哲创教之时，“心术至仁，而求之过速”，在古代虎狼遍地，推行“仁”已经颇为不易，到了近代，英人残酷，“过于爱物，反而不能保人”，故沦为别人奴仆。康有为在此引入他熟悉的《春秋》“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认为婆罗门教“将升平、太平世所用之说，用于据乱世，所以印人极弱”。[59]

印度衰落原因的第二层则是婆罗门教带来的种姓制度。康有为一开始对种姓制度了解不深，到印度之初，还在奇怪，所见人等，无论外貌智识，于前想象不同，后来才知晓印度古来人群众区分，因而得出结论：“然所见皆印下等人耳。若其上等人，聪明雄伟，此印度文明所以

为地球之先，不可以所见者该之。”康氏观察此情，如同发现新天地，反复申说。在感叹种姓制度对底层民众的摧残和对社会的危害时，他对将人严格分等之举很是厌恶，多加批评。“印之最不良者，在人类分等。”康有为在大吉岭时期，着手撰写后来著名的《大同书》，阐释人类平等之说。[60]该书中频频论述印度民众受不平等之苦，显然与其见闻密不可分。

人群分等，并不奇怪，就中国历史也不少见。但康有为在此夸大种姓等级制度对人的改造和区隔。比如他认为上、下等人从体貌到精神都有很大的区别，下等人“状貌黑小，目光无神”，而上等人“头脑广大，身体丰硕，目光精彩”。这种生理区别随代而传，愈发固化，“下等种人皆不讲文学，不讲养生，愚贱相传，故种愈坏”。不仅如此，康氏还将印度古文明和今日衰落的对比，与上下等人之分对应起来，营造反差。他说上等人少见，“印度道中所见，盖无上等人，其上等人深居简出，出必车马，无从一见，惟汽车中间见一二”，但只有见到他们，才能了解“印度先哲之何以独能聪明”。但到了近代，因下人居多，而导致群体智力不如，“夫上等人少，而遍国皆下等人，则智者少而愚者多，印度终以见灭，皆由人种不平之故也。”[61]在《大同书》里康有为也坚持此说，认为印度虽有两万万人，但若“除去诸劣下种”，只有一二千万，而下等人“无能为役”，导致其国大败。[62]

把古今之别与上下等人之力相对应，尽管就学理逻辑而言存在显然的矛盾，而后来康有为也改而强调“各省自立”对印度衰亡的影响。[63]但至少在《印度游记》里，他极为醉心这种把印度在近代的衰落简单地归咎于下等民众愚钝无力的解释，他对印度底层民众多有批评鞭挞，甚至不无种族主义的恶毒歧视。他说“所见印人皆极愚，状貌皆黑瘠渺小，头脑极小”。再比如他批评印度人懒惰无为，称“以缓怠无气之性质，懒惰极啬之作业，至愚之知识，不合之人种，而与方兴坚劲明敏之英人斗，宜其立灭也。今灭国百余年，而旧俗分毫不少变，其愚而不知大势如此，其灭固宜。”在别处又说，印人极弱，“嗟夫！比之欧人之智，此则宜为亡国之民”，还有说“而印人遂至极愚极弱，一灭于回，再灭于蒙，三灭于英，己国不保，夷为奴隶，人身不保，有类羊豕”。[64]

从这种说印度“宜灭”的论调和恣意夸张的行文里，我们得以窥探康有为初游印度时的心境。他用极端的笔调描述塑造印度人不思进取的形象，将其树为“亡国”之典型，而其更深之目的则在于中印对比和抑印扬中。康氏初到印度时，在加尔各答的唐人街天后庙做演讲，听众如梦似觉，半信半疑，他大为感慨，“嗟夫！比之欧人之智，此则宜为亡国之民！”[65]尽管在唐人街听演讲的大多为华人，但康有为对比他在加拿大演讲时所受到的欢迎和反响，作此感叹，不免有“环境塑造人”的考虑。他在谈印度人堕为“亡国之民”的同时，还说“中国人之尚气急功，勤作智巧，合种同心，与印度相反，实有自立之气势，自欧人外无如中国者”。对比印度种姓制度划分人等，他将中国视作平等思想之渊藪，即“不如中国人类平等。此真孔子之大功耳！”[66]

正如前述，康有为的印度游记与其他人相比，少了官样报告的束缚，而多了个人化色彩。他从“文明”的角度着眼，阐述中、印之间的联系和差别，这种观察的方式也是前人所不具备的。在游历北印度后，康有为为其游记写下序文，其中对“文明”概念作解说，“夫物相杂谓之文，物愈杂则文愈甚”，所以，只有相互的交流才能促进文明的成长。康氏说中华文明受印度的影响很深，因而扩充了其广度，但反过来，中华文明对印度却无甚影响，这倒造成了印度固步自封、不甚进取的局面。[67]所论看似怪异，但其立场何在，就此清楚。

吴广霁在光绪初年即已意识到，印度为中国提供了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失败的教训，故中国不

可轻易重蹈覆辙，但世事转而更下，到戊戌之后，在“亡国史”的大潮中，国人感叹的已是中国“居然沦为印度这境地”。[68]在此时代气氛中，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力图通过区别中、印，贬斥印度而营造中华文明之优势，以此激励民族自信。康氏《印度游记》作为历史文本，议论有时中和，有时偏激，不免混乱矛盾。然而，见其刻意之处，才知他心中真正所系何念。

五、结语

从今天的眼光看，印度地大人众，各区域的多样性纷繁复杂，晚清的游记作者们既不通当地语言，对宗教文化等也了解有限，因而纵使经历再丰富、记录再详细，也不免还是走马观花，所记带有管中窥豹的片面色彩。然而，尽管行游者记录下的种种究竟是否符合所游之地的真实尚有疑问，但研究行游者的眼光、期待和这些因素在游记中的反映，则还是能让今日的学者们找寻到几分真实性。

印度作为与中国相邻、却又异质的古文明，在近代同面临西力冲击，不论对晚清的学人，还是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都是思考自身近代转型的一个极好的参照对象。但这种思考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它经常面临着“多重他者”的立场移位。康有为在他的游记里时而援英而斥印、时而抑印而扬中，有时又举英、印的例子来批评中国，正体现了这种“他者”想象的游移。在殖民时代，伴随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叙事和各民族自身文化优越性和等级序列的表达，这种游移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但如果我们放长视野，与海外华裔移民之类长期居留异文化环境，文化认同本身已迁变多元的人士不同，本文述及的游记作者，仍然牢牢抱持基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认同。因此，行游实际上提供了在不断循环的“文化冲击”和“文化固守”过程中，重新确认自身文化认同的方式。[69]无论“他者”是印度还是英国，人们总是喜欢在透镜折射出的丰富多彩的影像中找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而这正是研究者最应关注的。

注释：

[①]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谭中《中国文化眼睛中印度形象的变迁》，张敏秋主编《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重庆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参考沈丹森(Tansen Sen)《中印海上互动：宋至明初中国海上力量在印度洋沿岸的崛起》，陈源源译，《复旦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③]康有为：《印度游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09 页。

[④]在此需说明，在中国传统里“观照”是一个有强烈佛教涵义的词汇。本文借用该词，并非是要研究中印交流史中极为重要的“佛教时代”，而是想以此词结合旅行写作中的“观看”和“映照”这两层，有关十九世纪中国旅行写作中“观看”的修辞模式问题，田晓菲在近作中提到许多有趣的例子，参见《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北京三联书店 2015 年版，第 150 页。

[⑤]康有为《印度游记》有手稿本和油印本两个版本，颇有不同。手稿今藏上海博物馆，油印本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油印本系经康有为之女康同璧重新整理删改。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列国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根据手稿本整理刊印；

而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则根据油印本整理。此段手稿本中作“第四人”，油印本中在“三藏”后加上了“惠云”，作“第五人”。康有为在印度所撰《须弥雪亭诗集》当中也有“支那次我第四客”的句子，见《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0 页。

[⑥]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09 页。

[⑦]除本文考察的六种游记（黄楦材诸文合计为一种）之外，晚清还有很多出使或考察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人士，走海路时也曾途经印度，或停留于港口，或经过其海域，有的还和上下船的印度人打过交道，比如郭嵩焘、张德彝、曾纪泽、薛福成等人都提到。但这些毕竟不属于赴印度游记，故本文不把这些日记当作专门研究对象。

[⑧]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 1985 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16 页。

[⑨]可参考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一章。

[⑩]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2 册，第 773 页。

[11]黄楦材（1843-1890），字不刁，号豪伯，江西上高人。游历考察印度之后，黄楦材被放至云南担任知县，后调京改授典馆协修，加稽查同文馆。1890 年在上海病逝。

[12]参见丁宝楨在光绪三年（1877 年）十月上奏《英人入藏探路用意狡谲请密饬驻藏大臣修好布鲁克巴以固藩篱片》，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90 页。

[13]参见黄楦材《西轱日记》卷首录奏稿。黄楦材此行记有《西轱日记》四卷、《游历刍言》一卷、《印度札记》二卷、《西徼水道》一卷，目前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得一斋杂著”四种，光绪十二年（1886 年）梦花轩重校本；还有成都志古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刊本；此四种亦收于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六册，杭州古籍书店 1985 年影印出版，第 13 册。有关内容可参见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第 17-29 页。目前关于黄楦材印度游历的研究不多，还可参林承节《黄楦材的印度游历和他的记载》，《南亚研究季刊》1991 年第 2 期；李宁《近代中国人视野中的印度形象——以黄楦材、康有为、谭云山为例》，华南师范大学 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

[14]比如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一书中就介绍了黄楦材的记述，以之看“一百年前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12 页。此后引之者甚多，不一一赘述。

[15]黄楦材《沪游脞记》，收入“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年影印本。亦可见政协上高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楦材文集》，政协上高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9 年出版。

[16]黄楦材《西轱日记》，卷四。黄楦材一行六人从成都出发，起初想取道西藏入印，但在巴塘受阻，其后只有改道云南，经丽江、大理、保山，由腾冲出关至缅甸，沿江而下到仰光后出海，搭船至加尔各答。到印度时已经是光绪五年闰三月。

[17]英印统治者很重视铁路的修建。印度第一条客运铁路建成于 1853 年，1870 年加尔各答和孟买之间的铁路开通，在 19 世纪下半叶，乘坐火车旅行在印度中下阶层业已成为一种风尚。参见沃尔波特著《印度史》，李建欣等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5 年版，第 226、241 页；林承节《印度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0-241 页。

[18]印度第一条电报线就是 1851 年在孟加拉地区铺设的。在 1857 年印度民众起义以及后来的总督时期，电报都发挥了极大的政治军事讯息的传播功能。参见沃尔波特《印度史》，第 228 页。

[19]黄楦材：《印度札记》，“得一斋杂著”本，卷上，第 2-4 页。

[20]此词借自田晓菲书，见《神游》第 201 页。

[21]黄楦材：《印度札记》，“得一斋杂著”本，卷上，第 10 页。

[22]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第 26 页。

- [23]黄楸材：《印度札记》，“得一斋杂著”本，卷上，第3页。
- [24]吴广霈（1855-1919），字瀚涛，号琴溪子、剑华、剑叟等，安徽泾县人；曾任江苏候补道、南京高等学堂监督，民国初年参与编修《清史稿》；光绪年间曾多次担任出使随员赴日、美等地。
- [25]马建忠：《南行记》，收于《适可斋记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本。吴广霈：《南行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弢园刊本。两者均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见杭州古籍书店影印版，第19册。马建忠、吴广霈此行由天津出发，走海路经香港、西贡、新加坡、檳城，而后到加尔各答。他们在印度本土只待了不到一个月，大大短于黄楸材，同年由孟买返程，经海路返回上海。
- [26]这两人在日记和中都没有提到过黄楸材，而且，吴广霈在《南行日记》中，自诩为唐代僧人游印度后第一人，虽有文学性夸张，亦可为旁证。
- [27]有关马建忠此前的经历和思想可以参考薛玉琴《近代思想前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
- [28]郑世璜：《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南洋印刷官厂1905年印行。
- [29]吴广霈：《南行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弢园刊本，见第11、19页。
- [30]吴广霈：《南行日记》，第15页。
- [31]冯客：《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 [32]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539页。
- [33]薛福成：《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6页。
- [34]马建忠：《南行记》，《马建忠集》，王梦珂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3页。吴广霈《南行日记》中所记文句大多相同。惟马建忠将此事记于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一日，吴广霈记于闰七月十二日，笔者逐日查阅前后所记，吴广霈《南行日记》的日期应较准确。
- [35]吴广霈：《剑华堂救时要策万言书》，上海著易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印，第6页。
- [36]吴广霈：《南行日记》，第17页。
- [37]吴广霈：《南行日记》，第15页。
- [38]如今笔者见到的《南行日记》为1890年弢园刊本，根据王韬在“序”中说，吴广霈在1881年自印度回国的途中经过香港，见王韬时示以日记，王韬当时就命人誊抄副本收藏，而1890年刊印的日记还是根据王收藏的副本。此本有吴广霈自序，序末署时间为“辛巳”（1881年），且此本日记所记到吴返程至香港为止，因而大致可推定此本为1881年原记，并非后来增添删改。可资对比的是，马建忠《适可斋记行》中所收《南行记》就记到回上海才结束，比吴广霈《南行日记》多记了五日。
- [39]郑世璜（1859-？），字渭臣，号蕙晨，浙江慈溪人，光绪己卯年（1879年）中举，曾任江西宜黄县知县。考察团成员除郑世璜和陆澐外，还有浙海关副税务司英国人赖发洛（L. A. Lyall）、翻译沈鉴、茶司吴又严，茶工苏致孝、陈逢丙等人。一行人由上海启程，由海路经东南亚到锡兰，而后到印度。
- [40]郑世璜《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陆澐《乙巳年调查印锡茶务日记》，均为1905年南洋印刷官厂印行。收于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6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陆澐的日记另有宣统元年（1909年）印本，相比多了陆氏在当年撰写的序文。
- [41]郑世璜《日记》后附《考察锡兰印度茶务并烟土税则清折》，以及《郑观察世璜上署两江总督周筹议改良内地茶业办法条陈》，《东方杂志》第3卷第3期，1906年。有关此事，民国时期的记述可见《中国考察印锡茶业的第一人》，《茶报》第1卷第2期，1937年；今人提到较多，较近的研究见曹英《华茶质量风波的扬抑》，《近代中外贸易冲突及中国应对举措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需要指出的是，考察茶务并非郑世璜此行的唯一目的，另一任务仍是调查印度的鸦片专卖和征税事务。此处不多展开，可参见刘增合《清末

的鸦片专卖》，张建雄主编《纪念虎门销烟一百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3 页。

[42]以上均见陆澐《乙巳年调查印锡茶务日记》，第 53 页，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日记。

[43]俞旦初《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初考》，《世界历史》1984 年第 1 期，第 27-28 页。邹振环《清末“亡国史”编译热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疏通知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90-392 页。

[44]梁启超：《爱国论》，《清议报》第 7 册，1899 年。参见杨瑞松《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像》，《东亚观念史集刊》第二期，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45]章太炎在日本接触到印度民族主义者，并在《民报》撰文介绍印度独立运动，是在 1906 年及其后。

[46]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09 页。

[47]康有为在 1901 年赴印度之前写成的海外游记有 1899 年发表的《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域多利义学记》、《游加拿大记》等，均为短篇。

[48]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光绪十六年”条，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14、22 页。

[49]学界对《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所记诸事的可靠性多有质疑，比如马忠文就提出，康有为在 1899 年至 1927 年间对年谱多有修订增删，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还可参看茅海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428 页。即使《婆罗门教考》实无其书，此二句是否系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加入，何时加入，也值得研究。

[50]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 42 页。

[51]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 89 页。

[52]康有为在 1899 年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到伦敦，短暂停留后同年又回到加拿大。

[53]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20 页。有关 1858 年女王确认对印度的最高统治权之后建构一套“礼仪风格”的问题，可以参考科恩《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的权威表象之确立》，载霍布斯鲍姆、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比较此文可见，康有为的观察还是颇为敏锐的。

[54]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13 页。

[55]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30 页。

[56]杨波：《口腹之欲与文化选择——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饮食书写》，《河南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

[57]康有为：《须弥雪亭诗集》，《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第 148-150 页。

[58]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29 页。

[59]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32 页。

[60]有关《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已有许多讨论。汤志钧提出，《大同书》撰写于康有为 1901 年至 1902 年旅居印度时期，而不可能是康氏自己说的 1884 年，参见《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 1984 年版；《再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广东社会科学》2004 年第 4 期。朱维铮还发现，《大同书》中举到的西方事例，最晚可以到 1909 年，证明康在离开印度后仍在不断修改增补，参见《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房德邻的结论较为确实周密，他认为《大同书》起稿较早，1901 至 1902 年在印度时，“基本完成了这部著作”，之后又陆续修改，直到 1913 年发表于《不忍》杂志，见《〈大同书〉起稿时间考》，《历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综合而观之，《大同书》的书稿主体撰写于印度时期，应无异议。

[61]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40 页。

- [62]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5 页。
- [63]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 334 页。
- [64]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以上分别见第 539、515、532 页。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康同璧编定《万木草堂遗稿》油印本时，将本段这些言论统统删去，目前这些语句仅见于康有为手稿本。可比较《康有为全集》和《康有为遗稿》的《印度游记》。另参见张荣华《维新事业在美洲的挫折与拓展：梁氏档案藏康有为书札考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近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92 页。
- [65]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19 页。
- [66]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15 页。
- [67]康有为：《印度游记》，《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 509 页。
- [68]《世界亡国小史》，《杭州白话报》1902 年，第 2 卷第 24 期。
- [69]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参见第四章。